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

文化与国际关系 精选文献导读

邢悦◎编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ected Readings

天津人民出版社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

文化与国际关系 精选文献导读

邢悦◎编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ected Readings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与国际关系精选文献导读 / 邢悦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8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

ISBN 978 - 7 - 201 - 07152 - 7

I. ①文… II. ①邢… III. ①国际文化关系—文献—
介绍—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5263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5.7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420 千字 印数: 1 - 2,000

定 价: 48.00 元

编者序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学术论著和专业教材的不断涌现。不过,笔者在近年的教学和研究中发现,虽然中国学者对冷战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新领域,如“文化研究热”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是中国学者的文化研究成果不论是在理论探讨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都有待深入和提高。事实上,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大国的对外行为不单是受现实利益和物质利益支配,文化同时也构成了国家判断其利益和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背景和环境。世界大国的对外政策和行为中必然包含文化价值观的考量,离开文化,人们很难理解和把握大国对外政策和行为的本质内涵和深层动机。对中国而言,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尤其重大。中国要崛起成为世界大国,不能不考虑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自身在国际社会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同时,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解决当今世界现实问题的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和观念。

除了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性外,文化研究及其成果也有必要尽快反映到专业教材中,以使学生对国际关系学发展的最新趋势和最新成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目前,在中国学者编写的国际关系概论类的教材中,许多国际关系学的核心概念,如无政府、国家利益、对外政策、权力等基本上是从现实主义角度作的解释,介绍国际关系理论的教材也较为偏重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而冷战后出现的建构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视角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现象产生的结果是,大多数学生在学习国际关系后,不自觉地从事理性主义和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待和分析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将国际关系视为争权夺利的竞争关系,忽视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伦理、国际规范和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文明进步。笔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人们不能仅仅关注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权力,而还要对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全人类命运有一种终极关怀。因此,有必要将国际关系的研究置于人类文明史的大背景下,以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综合视角来考察世界舞台上的国际关系,以获得对国际关系更为宏观、全面、深刻的认识。

《文化与国际关系精选文献导读》汇集了一部分从文化角度考察国际关系的著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现有的较高研究成果。本书的目的除了激发读者对国际关系中文化研究的兴趣,使读者了解国际关系中文化研究的现状外,还想引

2 \ 编者序

发读者对“文化与国际关系”的深入思考和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文化主要指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文化价值观,也包括国际社会和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普遍持有的态度、观念、信念和意识形态等。它的对应物是“社会的物质存在”,即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主要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价值观是文化中最一般、最抽象和最稳定的东西,对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如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和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构成强大的制约作用。

本书从三个层次分析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第一个层次是世界体系。世界体系的文化是指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体对于自身、“我者”与“他者”的关系以及自身所处的环境或世界所持有的共同知识,亦即世界体系中的国家所共有的观念,它表现为国际伦理和国际规范,如近代以来的民族自决原则、主权平等原则等。第二个层次是介于体系文化和民族国家文化之间的“同源文化”。同源文化是指建立在同一根源基础上的文化,如美国文化是欧洲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两者在本质上都属于基督教文化圈,所以它们是同源文化;而中国文化属于儒家文化圈,与基督教文化没有关系,所以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不是同源文化。第三个层次是民族国家文化。民族国家文化是指民族国家的大众和精英普遍持有的对自己国家、所处国际环境以及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的认识。文化人类学也把民族国家文化定义为支配一个民族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

本书共分三编,每编分四讲。第一编“文化与国际社会”,首先运用建构主义理论从最宏观层次分析了三种体系文化的特征,以及与之对应的三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其次分析了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对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的影响;最后分析了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表现形态和当代文化全球化的特点。第二编“文化与主权国家”,从国家层次分析民族国家文化在确定国家利益、制定国家对外政策、运用国家权力和影响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同时还从文化角度对国际关系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国家利益、对外政策、权力等)进行了新的阐释。第三编“中国文化与国际关系”,立足于世界历史中的“中国问题”,体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意识”,集中讨论中国文化中的世界观,传统文化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中的作用,以及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问题和可以发挥的作用等。

本书选取阅读材料的标准主要有五个,具体如下:

第一,经典性。书中所选取的材料大部分是公认的国内外著名学者的经典著作,可以代表这一领域最高最新的研究成果。

第二,学术性。除极少数优秀的评论文章外,本书所选取的绝大部分材料均是作者长期研究而完成的学术作品,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现实性。除了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外,本书所选取的材料还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尤其要对当前世界和中国面临的问题有清醒的观察、睿智的思考和深入的分析。

第四,可读性。考虑到本书的读者主要是学生,本书尽量不选取过于晦涩难懂的著述,而尽量采用文笔流畅、形象生动又不失严谨的学术作品。

第五,开放性。尽管本书是国际关系学科的读本,但本书选取的材料不局限于国际关系学的著作,而是在文、史、哲、政、经等人文社科的学术宝藏中筛选有关“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杰出作品。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笔者对书中每篇阅读材料都写了导读。此外,为了使读者能了解当前“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更多成果,每一讲后面都附有延伸阅读材料。

尽管本书强调文化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研究国际关系如果离开文化,就不可能对国际关系有深刻的了解和透彻的分析。但如同没有任何一个概念或理论可以揭示国际关系的本质或解释国际关系的全貌一样,文化因素在研究国际关系时也有其局限性。文化在国际关系中并非无所不在,文化与国际重大事件之间并非有显而易见的直接和必然的联系,文化并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国际社会的一切现象,文化更不能预测某个具体的国际事件的发展和方向和国家作出的具体的对外决策。

同时,在目前的国际关系领域,文化研究方法仍有待提高和完善。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研究主要以传统研究方法为主。在实证研究中,如何确定文化变量和如何控制文化变量的问题仍需进行更多的探索。由于文化既有稳定性又随时代而变化,尤其是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人们在对文化性质的界定和文化内容的把握上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同时,人们也很难用科学实证研究的方法找到一个判断文化性质和影响程度的公认的标准。即便人们很清楚地了解某一文化的内容,在具体的研究中也存在如何把文化因素从导致事件发生的众多因素中剥离出来的困难。此外,文化的运行机制问题,如文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文化与制度之间是什么关系等,也是未来的文化研究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鉴于此,本书不仅为大家提供文化研究的成果,而且希望大家看到,文化研究不仅是一个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文化研究中还有许多有挑战性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而且从本书的选材可以看出,除了对中国文化的

4 \ 编者序

研究外,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的文化研究领域内有重大影响的学术作品还十分有限,我们由衷地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国际关系学界的中国学者能贡献出更多的精品和佳作。

本书得到清华大学王雪莲教育基金资助。我指导的研究生詹奕嘉参与了本书选材和编写导读的工作,王瑞、李振江、高蒙、赵毅和侯立宽参与了本书的编辑和校对工作,特此致谢。

同时,我要感谢那些给本书提出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的学界前辈和同行们,他们是: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史志钦教授、孙学峰博士、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北大出版社耿协峰博士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宋伟博士。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领导及本书的责任编辑王康女士,本书得以面世当归功于他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的一贯重视和支持。王康女士对本书全文逐字逐句地进行了编释,对原文中的疏漏之处作了修正,使本书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感谢本书所选文章的各位作者或译者,他们的优秀作品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活跃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和学术上的提升。更可贵的是,他们本人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慷慨支持。感谢那些多年来在我主持的《文化与国际关系》课上孜孜以求的学生们,他们为本书提出了要求,也是促使笔者尽力出版本书的动力。

本书适合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类课程和当代世界类人文素质课的辅助教材,也可以作为国际关系学专业研究生《文化与国际关系》研讨课的必读材料,对有兴趣研究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的研究者也会有不少帮助。

笔者水平有限,所编撰的这份读本必有错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邢 悦

2011年春于清华园新斋

目 录

绪论: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	陈乐民(1)
----------------------	----------

第一编 文化与国际社会

第一讲 文化与世界体系	(11)
三种世界体系文化	亚历山大·温特(11)
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	秦亚青(38)
第二讲 文化与国际安全	(50)
文明的冲突	塞缪尔·亨廷顿(50)
“文明冲突论”的批判	哈拉尔德·米勒(73)
文化途径是否和平大道?	汉斯·摩根索(89)
第三讲 文化与国际合作	(95)
文化与经济合作	塞缪尔·亨廷顿(95)
国际谈判:文化因素	盖伊·奥利维尔·法尔(101)
第四讲 文化与全球化	(119)
全球化、文化与国家的命运	戴维·赫尔德等(119)
全球化的文化动力	彼得·伯杰(147)
拓展阅读	(160)

第二编 文化与主权国家

第一讲 文化与国家利益	(165)
文化、身份与国家利益	亚历山大·温特(165)
我们是谁?	塞缪尔·亨廷顿(183)
第二讲 文化与国民性	(194)
战争中的日本人	本尼迪克特(194)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206)

公民传统与政治变革	罗伯特·帕特南(222)
第三讲 文化与软力量	(246)
软权力	约瑟夫·奈(246)
文化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	戴维·兰德斯(258)
第四讲 文化与对外政策	(270)
观念与对外政策的分析框架	罗伯特·基欧汉(270)
美国的政治文化与对外政策	杰里尔·罗塞蒂(295)
拓展阅读	(302)

第三编 中国文化与国际关系

第一讲 中国文化中的世界体系	(307)
“天下”理念	赵汀阳(307)
荀子的“国际权力”观	阎学通(333)
第二讲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339)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	冯天瑜(339)
中国现代的“华夏中心观”与“民族主义”	雷 颐(347)
第三讲 中国文化与中外关系	(353)
中国传统文化与晚清对外政策的矛盾	王尔敏(353)
中国对外关系的文化遗产	安德鲁·内森 罗伯特·罗斯(377)
第四讲 中国文化与全球化	(389)
中国处于“文化孤立”之中吗?	余秋雨(389)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李慎之(395)
拓展阅读	(403)

绪论: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①

陈乐民

【导读】

冷战结束后,“世界向何处去”成为国际关系学界激烈争辩的核心议题,不同国家、不同流派、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纷纷作出思考和回应。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一面世,便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学者大都对其“文明的冲突将主宰21世纪的国际政治”的观点大加鞭挞。而陈乐民先生则认为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为我们拓展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契机,启发我们对国际关系的关注点从安全、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与国际关系”领域,启发我们对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从时事性描述和因果关系的阐释上升到把国际政治置于人类文明史的大背景下进行历史的、综合的考察。当我们把国际政治看做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国家间的纷争、冲突、对抗只不过是人类文明大舞台上多幕戏剧中的插曲,多元文明不同程度和不同层次上的共存、交流和融合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当然,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在人类文明史的大背景下研究国际问题并非易事。唯有积累足够的文史素养、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在宏观上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能力,才能对国际关系有更深刻的思考、理解和见解。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在中国似乎愈加成为一门“显学”了。首先是关心的人多了,执笔为文的也多了。国内外的一些理论动向(尤其是国外的),各方提出的新问题、新视角,都十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每每议论风生,气氛活跃。这表明,热心于国际政治的人已经不满足于对事件的描绘(哪怕是极细微的描绘),而是把眼光

^① 陈乐民:《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本文原为王缉思主编的《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书的“序言”,在《太平洋学报》发表时略有修改。该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12月出版。陈乐民(1930—2008年),中国学界和思想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欧洲学会会长。长期从事“民间外交”、国际政治和中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欧剧变和欧洲重建》、《战后英国外交史》、《西方外交思想史》等。

2 \ 绪论: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

聚集在国际局势和人类社会的走势上。旧的框架既已突破,新的框架(如果可能有的话)会是个什么样子,自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种政治力量,乃至每个有政治意识的个人,都不能置身其外。为此,或许可以说,国际政治已是大众之学。

国际政治的领域因此大为拓宽了。过去我们一般比较偏重于从政治层面看世界上的事情,即政治性质的斗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只要一提起东方、西方之类的问题来,大多是以意识形态的对立作为“划线”、“站队”标准的。无论东方、西方概莫能外——在中国,就是要坚持反对帝修反的政治立场。60年代发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辩论”,今天五六十岁以上的人肯定都还记得很清楚。到了70年代,国际政治的内涵已渐渐地扩大了许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经济在国际政治中的功能和分量,显著地进一步地明显化了,那是因为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推动着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当世人还没有来得及理清自己思路的时候,一场持续进行的、高一级的产业革命已经发出将深刻影响国际政治和人类社会的信息。至于那时的中国,则正忙于使自己倒退的“文化大革命”;与西方许多国家建立邦交并没有因此而使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世界在我们的眼中仍然只是几个“世界”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人类社会的脚步诚然是加快了,不容世人以常规视之。在中国,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更新了中国人看世界的习惯。我们国际问题的研究者在几年的时间内,就迅速跟上了世界的潮流,把政治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里,已是运用得相当圆熟了。

近几年,以纪念“地理大发现”五百周年为契机,我国学者在研究领域又拓宽了一大步,把国际问题同世界历史联接起来,超越了对具体问题的论述和分析,进入了对人类社会前途的索解。“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即是其反映,它至少从学理上增加了新的研究内涵。人类历史是按照怎样的轨迹运行的?今天的人类社会正处在这条轨迹上的什么位置?人们把中外先哲曾经提出过的问题,在崭新的高度上又提出来了。

差不多同时,中国学者读到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在中国,对亨廷顿文章的反应比前几年对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反应要广泛和深入得多。使我觉得新鲜的是,学者们不仅注意到了政治和经济的结合,而且把国际政治同人类的文明史挂起了钩。把国际政治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轨迹上来加以历史的、综合的考察,在西方并不自今日始,但只是到最近几年,尤其是亨廷顿的文章,才引起我们集中的注意。因为我们有意无意地已习惯于把“国际政治”同“国际时事”和

对具体问题提出实用性方案画了等号。现在讨论的问题,则是使研究更加深入、更具思辨性,并试图站在整个文明的高度去俯视世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这在我们是一种理论尝试,开始时似乎有个多少使人觉得“文明”与“国际政治”两张皮的问题;即使是亨廷顿笔下的“文明”,也分明是政治化了的(或意识形态化了的)“文明”。然而“文明”既已在“国际政治”中出场了,那就需要把这个持之有故的问题抓住,并深究下去。我们的理论工作该当把它弄得能够自圆其说。

长期以来,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即把国际政治纳入世界历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纳入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在这个大框架里,千变万化的国际政治,无非是其中的戏剧、插曲,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曲折反映,都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长江大河中激荡起来的浪花。所以文明(文化)与国际政治到底有什么关系,就需置身于这条长江大河中去观察。我感到,从“文明”到“国际政治”需要有个联结点,而联结“文明”与“国际政治”的只能是历史——是文明造就了历史,国际政治则是整体的世界历史的“部件”。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文明,就相应地该有什么样的历史。“文明”好像一只无形的巨手,改造着社会,支撑着国家,牵动着、主宰着人类的历史,也因此影响着历史中的国际政治(在有些国家的大学里,“国际政治”是放在历史系里的。我国南京大学也是把“国际政治”作为历史系的一个专业。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如此说来,文明的涵盖面不可谓不广矣,其威力亦不可谓不大矣,真所谓无所不包了。巴尔扎克说,社会的各种敌对力量都在彼此抵消,却把“全部权力”留给了“文明”这个取代了国王的“伟大的皇后”——“这个古老的可怕的形象,这个人类在上天和他之间创造的虚假的主宰”^①! 我比较赞赏 19 世纪法国史学家基佐的概括,他认为,“文明”之为物盖可解为人类社会发展与精神发展之本原和综合;因此,文明有如“造成一个民族的财富的一片海洋;这个民族生活的一切因素、其赖以生存的全部力量都寓居于这片海洋之中”。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从每个世纪当中,从每种形态的文明当中,把起支配作用的思想——即普遍采用的原则——分理出来,因为正是它们给受制于其威力的几代人或则带来福祉,或则造成不幸,甚且影响及于后代人的命运”^②。

基佐的这些话大约可以分为三层意思:一,文明是物质的和精神的总和;二,文

① [法]巴尔扎克:《驴皮记》,参见《巴尔扎克全集》(第 20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第 78 页。

② [法]弗朗索瓦·基佐:《欧洲文明史》,HACHETTE,1985 年,第 30、31 页。

明是历史过程中的产物,因之文明本身也是一种过程;三,文明是与民族的成长联系在一起。施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汤因比延续并进而阐发己意,表述虽异,义理则一。由此可以想见,文明既然不是超时空的普遍人类文明,那么各种文明便都有其内在的天然生成和发展的依据和规律。征之于华裔美国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的“长期历史合理性”历史观,文明史亦当作如是观。

同时,各种文明还具有不同程度的外扩性质。人类越是深入到文明时代,文明的外扩品格便愈加为人所感到。不同的文明在交汇中总免不了相互排斥或相互吸引。相互排斥表明文明含有不易改变的个性,相互吸引则表明文明具有可塑性和可变性。因此在历史进程中,一成不变的文明是没有的;在一个时期内全然改观的文明也是不可思议的。沿着文明的外扩性去想,则会发现地球上的人类社会必定要通向“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从而取代“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①。

以上拉杂说来,约可归结为关于文明的一条线索,化为一个世界历史框架内的“公式”,就是:文明——国家(民族)——国际政治——全球化进程:人类社会的走向与前瞻。这条线索与康德提出的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的理性发展是重合的:

……这条线索不仅能够有助于廓清人间事物的如此纷繁混乱的表现,并为未来的种种国家变化提供政治预言的艺术(人类历史之为用早富于此,尽管每每被视为似乎与之无关的无规律自由的一种结果),而且还会——不假定有一种大自然的计划,我们就没有理由可以希望这一点——提出一幅令人欣慰的未来远景:它远距离地展示出人类物种怎样终于达到这样一种状态,那时候大自然在人间所播下的全部种子都将能充分地发育成长,而人类的使命也就能够在大地上实现。^②

显然这条从低到高的线索,绝不是一条直线,人类在它的漫长旅途中,要经历各种文明的相互激荡、冲突和融合。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冲突往往表现为不同地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

② [德]康德:《世界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康德论历史》,英译本,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 INDIANAPOLIS, 1984, p. 25。

的人群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势,假“文明”之名以行的冲突。然而如果排除了那些人为的、外在于文明的种种政治倾向和意图,则“文明”之间,存在着的便该是歧异和类比,而歧异并不见得是迎头相撞的冲突。因此现在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实是托言“文明”的政治冲突,或是给政治冲突披上了一件“文明”的外衣,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如此纷繁混乱的表现”。把这些表现“廓清”之后,若单纯从文明自身的固有性格出发,或从其发展史来看,倒是多元文明程度不同的、不同层次上的“共存”、“交流”或“融合”,才更应是人类文明史的大趋势。

或谓,这岂不是提倡“世界文化”么?而从今天的现实看,明明差着十万八千里,岂不是放言空论么?对这类问题不能做非黑即白的回答,也不是人的主观上提倡或不提倡的问题;而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看,普世性的文明成分所占的比重,定将越来越高,而不是相反。事实上,科学技术的跨地区、跨民族的普及,市场经济规律和机制的超越国界、区界的流行,对人际关系、社会关系、道德准则、思维方式等等,都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使地域之间、民族之间、人群之间的距离(差别)逐渐地、但却明显地缩小。

准此,我们必须看到事物的两面:趋势的、进程的一面和现世存在的问题的另一面,不要让其中的一面遮住视线。即如不久前中国学者在讨论“全球化”问题时,李慎之先生说过的一段话:

不要仅仅看到今天的世界上还充满了对抗与争夺、征战与杀戮,事实上,人类已经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的融合已经在开始了。根据现在已有的各种知识推断,人这个物种应该是起于同一个源头的,但是在以后若干万年的过程中却由于求生存而散布到地球上各个角落,一群一群地在相互隔离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化。这种情况大概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道术已为天下裂”了。但是它却并不就是“往而不返,必不合矣”。随着交通能力的进步和生存条件的改善,分散的人群又慢慢地会合起来了。到距今整整500年以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各地的人类总算又互相知道了彼此的存在,但是交往的程度仍然是只能慢慢地增加。一直到5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才可以认真地说,全球化的时代开始了。人员、物资、能量、信息现在是全球范围内交流,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这样的交流必然要带来各个民族与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所以裂了的道术还是要合的。钱钟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

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才是通人之言,见道之论。^①

这就是说,人类文化作为一种过程,必定要见其分,也见其合。历史已为见证。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源头本不在西方,倒是从东方移过去而与希腊罗马文明相融合、并扎根于西欧的。从文化形态学来看,现在习说的“基督教文明”实是东西文化早期会合而成的。甚至在封闭的西欧中世纪,希腊文化、阿拉伯文化、小亚细亚文化,仍得以通过意大利南方和地中海南北两岸渗入西欧。阿威洛依主义便是纽带之一。而纯属西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光芒,也照射到了拜占庭的欧亚交界地区和北非。诚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要晚几个世纪,而且经历了不同的路程和表现,然而可以说,相互隔离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使不同文明相遇时会因差异而引起“冲突”,但那“冲突”所产生的效应,同样会包含“融合”的成分。这里的所谓“冲突”指的是差异的延伸;同样,“融合”也是差异的延伸。

这就要求我们通观人类历史的学者,具有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眼光。这实在算不得新鲜的道理,从中国的《礼运》到西方的空想共产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到今天的“全球化”——从古圣先哲到今天,都是把人类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诚然,思想家的理念包含着矛盾,因为在他们从不同立场向往的世界前景中,人类无法绕过他们在思想里、学说里试图战胜的充斥着分裂、纷争、厮杀、战乱的现实。康德的理性主义世界历史观,已经涵盖了违背理性主义的种种表现;在达到“整合”之前,“解构”是不可免的阶段,这就需要承认整合化在时、空观念上必然表现为“过程”。这是一个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国际政治学相结合的问题。

所以文明与国际政治似乎有两重意思可说:一是既然文明可以决定一国的发展,由此自会影响该国(通过其执政集团)在对外关系中的思想、政策、举措以及国际政治的样式。二是在“全球化”的远视角下的不同时代的国际政治,归根到底不过是人类文明史(冲突和融合的历史)大舞台上的多幕戏剧;无论舞台上进行着怎样的表演,“戏剧”的进行总是越来越接近人类文明的目的地。也许可以说,前者是政治学的命题,后者是哲学和人类学的命题。于此,仔细玩味一下康德设想的“理想图”,或许是很有意思的:

来自强权方面的暴力行为将会减少,遵守法律将会增多。在政治团体中大

① 李慎之:《辨同异、合东西——中国文化前景展望》,《东方》,1994年第3期,第8页。

概会有更多的美好行为,更少的诉讼纠纷,更多的信用可靠,等等,部分地是出于荣誉感,部分地是出于更好地理解到自己的利益。这就终于也会扩展到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外部关系上,并朝向世界性社会的实现迈进,而丝毫也不需要增加人类的道德基础;为此,另一种(超自然影响)的创造物是必要的。因为关于人类在其朝着改善的前进中,我们也不应期望过多,以免有理由要遭受政治家们的讥笑,他们常是宁可把人类的希望当做一种狂乱梦想的。^①

在那个时代,康德只能寄望于“大自然的计划”、“超自然影响的创造物”,等等。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个“超自然的创造物”已经不是带有神秘色彩的、不可捉摸的概念了;人类无需再求助于宗教色彩的“超自然”了。我们对古圣先哲们提出的各色“理想国”,似乎亦不应只纯以虚幻无着的乌托邦目之了。因为科技力量信息时代已取代了“超(或‘大’)自然”。

一般说来,当涉及国际政治领域的问题时,主要是讲矛盾、冲突,协商谈判也是以矛盾或冲突为前提的。亨廷顿的文章讲的就是矛盾和冲突。不过他给冲突披了“文明”的衣服,却又根本抛开不同文明的自身内涵,并定为“范式”,其实着眼的还是眼前的现实政治冲突,同人类文明自身的发展(含冲突与融合)看不出有什么有机的联属。

但是,对于我们的国际政治的研究者来说,意义并不在亨廷顿文章本身和它的品评,而在于亨廷顿给我们出了个作文的题目,启发我们使国际政治从大厦的一隅走向世界文明史的整个大厦,视野大大地拓宽了。在我看来,从以政治斗争为主的世界通史的视角看,人类社会到处是冲突;而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看,则总趋势当是融合,即便是在激烈的冲突中,也潜在着未来的融合。文章人人得而作之,各有各的作法;亨廷顿的文章开了个头,我们用不着跟着他转。但是,由此更可见:孤立地、现象地看国际政治,只是国际政治(经济)事件的积累;把文明和国际政治联系起来,国际政治便成为人类从古到今为了文明而进行斗争的历史当中的长剧和短剧,因而不会就事论事。19世纪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把文明比做鹿,说政治如同射手,当然射手不只一人,射法也因人而异,但目标却在于射鹿和得鹿。^②文明之为物,既宽泛博大如此,则偏执地执著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狂妄而狭隘的观念,就显得虽

① [德]康德:《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康德论历史》,第151页。

②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1页。

然用了些“文明”之类的概念,但其实仍是老观念。世界历史的前景必定该超越东西方的旧观念,必定该超越各种“中心主义”,不管是来自东方的,还是来自西方的。

我们常说,国际政治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它联着文、史、哲、政、经。国际政治若要走时事描述性和阐释性的层次并上升到理论思辨的层次,是非走跨学科的道路不可的。确实的,从近几年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看:一方面,国际问题的研究已在叩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史)的大门,因为它需要文史素养和思维上的支撑与丰富,以便使国际问题的研究同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文史领域的研究,在当今世界已经联成一片的世纪里,也需要突破传统的樊篱,把视线投向广阔的世界空间,以收登高望远之效。刘勰有几句话:“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治学该当追求这样的境界。